

戎馬生涯 (十五)

李品仙

隨勝利上演的悲劇

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我從安慶飛赴南京，翌日即由京隨同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一同赴渝，出席十一日舉行的軍事復員會議。與會人員，有陸軍總司令、軍政部部长、軍令部部长、各行營主任、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其他軍事重要部門主任；會議由軍政部部长陳誠將軍召集。此次會議的內容，顧名思義，可想而知是使軍隊由戰時的擴張狀態，回復戰後的平時狀態。其主要議案大意如左：

- (一) 各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等主官職位及機構一律撤消。
 - (二) 全國軍隊按平時編制，以師為單位，保留六十個整編師。
 - (三) 停止征兵。
 - (四) 所有游雜部隊及偽軍一律收束編遣。
 - (五) 軍事人員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 (六) 行政官吏不得兼任黨務工作。
- 會議進行非常順利；很少有人提出疑問，大部時間都是聽取議案的解釋。此等議案想早已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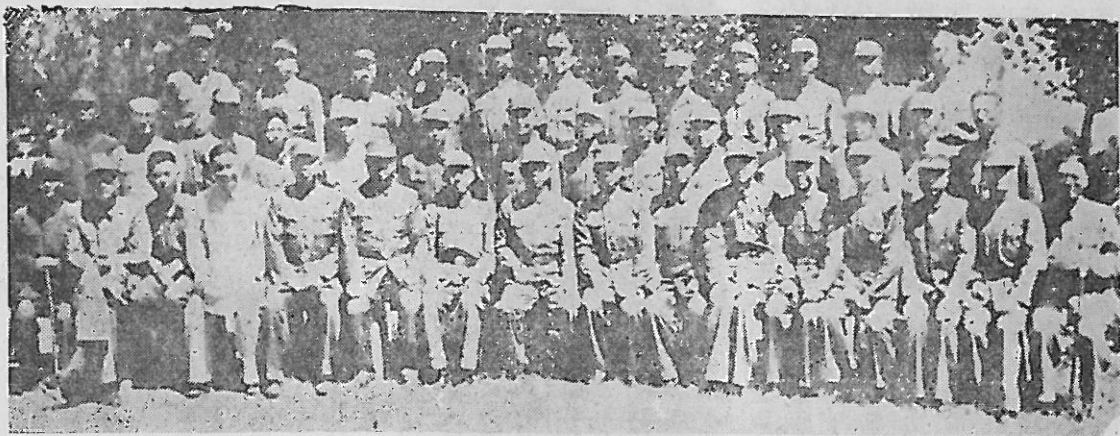
妥並經考慮週詳，所以很快都獲得通過。閉會時主席說明，此次大會議定各案，實為戰後整軍，使軍隊國家化的要務，既經全體決定必須迅速實施。

早在我赴渝出席軍事復員會議之前，於前往徐州視察受降及接收情形之際，曾獲知共匪陳毅等部隊在蘇北一帶企圖異動之情報，並已組織蘇魯皖邊區蘇維埃政府，嗣又派遣軍隊竄至徐州南方之三堡附近，將鐵路破壞，阻撓國軍運輸，及迫令當地日軍向他們投降。當即判斷共匪必在最短期間內公然從事叛亂。故我回至蚌埠之後，即欲建議中樞，在徐、蚌接收之後，以第十戰區之現有兵力進剿蘇北共匪，根除後患。當時我十九集團軍正奉命自徐州向泰安、濟南北上保護津浦路之交通，十五集團軍已進駐徐州，廿一集團軍在蚌埠以南，另有郝鵬舉、張嵐峯兩部偽軍，各約一萬餘人，隊伍亦頗整齊，則在徐州至歸德一帶候命收編。依當時的計劃，擬以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及陳大慶的十九集團軍，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斷蘇北與魯南共匪的連絡，阻止蘇北共匪北竄；然後以二十一集團軍為主力，配合郝鵬舉

、張嵐峯兩部偽軍，由盱眙、天長東進，向蘇北共匪包圍進剿，予以殲滅；最後轉移主力指向魯南沂蒙山區，將魯南殘匪圍殲於東海岸一帶地區。二十一集團軍過去與共匪作戰多次均獲勝利，頗有經驗，共匪對他非常畏忌，相信不難予以肅清。

上項計劃我曾向李主任宗仁申說（李當時任行營主任），請他轉請中樞核奪；我至重慶開會時，亦想將之作成提案，密陳統帥部核辦。至開會後，因會中第一個議題即是復員整軍，戰區長官部、集團軍總司令均在撤消之列，所有各軍均須縮編為師，同時規定遣散所有游雜部隊及偽軍；我深感我的提案與會議各案的性質大相背馳，為免與中央政策發生抵觸，遂將提案的計劃取消。李宗仁主任可能亦因此未便向統帥部提議。當時我曾就是否應另向中樞建議一事，反覆思量，後來我想到統帥部對各方面的情形當知之較詳，對共匪的陰謀必有應付良策，不必過分憂慮而作罷。

於是，會後即過返合肥，着手辦理復員整軍工作；首先將我所兼的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一職



本日投降後次日本文作者召集第十戰區黨政軍高級官員討論復工員會時留影。

報請解除，由中央黨部派劉真同志接任。嗣即下令撤消戰區長官部、各集團軍總部、軍司令部等機構。其間因人員安置調動及編遣經費領放問題一時未獲解決，執行不免稍遲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中旬，中央政府還都南京後，又召開第二次復員會議；會中討論議案，概仍是上次議案的重申，不過解決了若干枝節問題，主要在催促實施縮編而已。會後我即將第十戰區長官部一切未了事宜於四月中旬辦理結束，所部各軍師亦悉按命令整編完成。二十一集團軍的三個軍，縮編為三師，改隸第八綏靖區管轄，由中央派夏威為第八綏靖區司令，我本人則奉令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此時郝鵬舉、張嵐峯兩部偽軍已由徐州北去，迄無下落，可能已為共匪所迫編了。

當中央政府積極進行復員整軍之際，共匪却乘機積極擴充，同時襲攻國軍，爭據城鎮。中央政府要撤消淪陷區的各偽組織，共匪則在竄據地區成立共黨政權，與中樞分庭抗禮。中央政府召集國民大會從事制憲及選舉總統副總統選政於民，共匪則拒絕參加，並煽惑各地青年學生遊行示威，反對政府。同時派林彪匪部竄往關外，在蘇俄的掩護下，接收東北全部日軍遺留的武器、物資，迫編以前偽滿的全部偽軍，不下十餘萬人。我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軍隊與人員，蘇俄則拒絕移交或藉故阻撓。如是共匪乃乘機坐大，數月之間，僅東北一隅，共匪軍隊即發展至數十萬之眾。其他蘇、魯、冀南、晉西等地，共匪接收及劫掠的人員武器，合計起來亦不下數十萬人。從此匪軍勢力益形膨漲，愈難就範了。

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後，即決定裁軍復員，取消戰時各級軍事指揮機構，調整黨政工作人員，並已決定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普選，還政於民。此乃是國家建國必然的程序，無論任何黨派，任何軍隊，均應絕對遵守。共匪對此不但不予遵守執行，反而利用機會擴大軍隊，組織蘇維埃政府，霸據地盤，襲擊國軍，破壞國家統一，其企圖傾覆政府，已昭然若揭。我中央政府，如在此時，即不顧一切，毅然決然宣佈共匪罪狀，下令討伐，乘我軍勝日餘威，以領袖蔣公受舉國民熱烈擁戴之德望，復以戰時指揮機構猶未撤消，軍隊部署仍能迅速，即集結大軍分途進剿，以當時強大之形勢，對付破敗不整之共匪，未始不可一鼓蕩平；縱使一時不能解決，亦不至使共匪若是猖狂。無如我中央政府，因受外交上之壓力，與盟邦不友誼的行為，竟使中華民國不亡於日本，而毀於共禍，實非吾人始料所及。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中日開戰之初，蘇俄本是支持我國的友邦，旋因有事於歐洲，轉與日本拉攏，訂立中立條約，最後復出兵對日，其不顧信義，世所熟知，且蘇俄是國際共黨的首腦，其暗助中共亦不足怪。惟美英兩國，在日本襲擊珍珠港，攻佔新加坡之後，已與我締盟共同對日，期我能牽制日軍主力於中國戰場，以減輕彼等所受之壓力，俾彼等能從容集中力量拯救歐洲，理宜與我開誠相見有始有終，不料在德、義、日軸心行將崩潰之時，竟與俄國簽訂雅爾達祕約，出賣我國；不經中國同意，即將我東北之中東、南滿兩鐵路，以及大連

、旅順兩港的特殊權利讓與蘇俄，並承認外蒙古之獨立，以換取其對日參戰。這種以犧牲中國，來減輕美國對日負擔的作法，實有悖信義。如果企圖以換取蘇俄放棄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轉而支持我中央政府統一全中國，那無異緣木求魚，更荒謬可笑！

結果，雅爾達祕約徒然使中國八年抗戰的成果遭受犧牲，由雅爾達祕約所帶來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只是一張白紙。反使蘇俄假借對日參戰之名入據我東北之後，一方面阻撓我對東北主權的接收，同時在其掩護之下，使共匪方面利用旅順、大連源源開入東北，並盡量協助共匪，將日本關東軍在東北所遺留的大量武器轉移於共匪之手，支助共匪顛覆我中央政府，以遂其赤化中國進而赤化亞洲與世界的一貫政策。這樣，中國固然是首蒙其殃，對赤化整個世界，又何嘗不是推進了一大步！卒至造成今日東亞險惡的風雲及未來的危險，試問美國友邦對自身是利乎？是害乎？

更可慨嘆的，是美國朝野對蘇俄赤化世界的陰謀既毫無警覺，對中國共黨的狡詐欺騙更蒙昧無知，中了國際共黨宣傳的毒素與滲透分化猶不自覺，一味聽信共黨對盟邦政府捏造攻訐的謠言，及潛伏於其國務院內一批共黨同路人不盡不實的虛報，早在抗戰結束後迭次派遣外交人員前來我國調處，要求我中央政府接受共匪的無理要求，使共匪得售其奸計而得隴望蜀益形狂妄。這樣調處實無異引風滅火，益助其燃，自然得不到效果。及後，共匪已全面發動叛亂，此時政府軍事力量尚能控制全局分別防刺之際，美國復於三

十四年底又派遣馬歇爾以特使身份前來我國調處，成立三人小組，要求政府下令停戰從事協商；殊不知共匪是一向不守信義的，國軍遵令停戰而共匪反乘機擴張，且惡人先告狀，共匪每次開黨必控訴國軍違反協定。馬歇爾可能早已中了共匪宣傳毒素，總是偏聽共匪謊言，認是國軍違背停戰令破壞協議，對國軍大加限制。這樣停戰調處，與其說是調處，無寧說是提供共匪襲擊國軍的掩護。變非法為合法；若國軍違令停戰協商則無異自縛手脚。共匪得此便利，遂利用協商作談話打打，有利則推翻協議造成既成事實，不利即呼籲停戰解除危險；結果共匪得以坐大，國軍則從此日削矣。

馬歇爾特使八個月的奔走斡旋，在共匪屢次破壞協議之下，不但不能達成停火，而衝突益形擴大。至三十五年八、九月間，共匪在蘇俄的掩護下，已控制大部份東北地區，取得了東北日軍遺留的大量武器，並收編了十餘萬的偽軍。此時共匪在關外羽翼已豐，在關內也完成了各種部署，遂變本加厲，將政治協商會議已達成的協議，全部推翻並大舉進攻國軍，所謂三人小組已無形解體。馬歇爾在調處失敗之後，竟停止對我政府的軍援，並於三十六年一月回國，一走了之；同時撤退全部顧問人員與經援物資，使政府遭受缺乏軍事補給與經濟崩潰的雙重壓力，更無異於落井下石了。

共匪是俄共的螟蛉，目的在赤化中國；他要奪取整個政權，而不是僅僅想分一杯羹的。說得更透澈一點的話，他是遵照蘇俄第三國際共黨的

指示，以赤化中國作為赤化世界之主要步驟；因此決不是馬歇爾前來調處可以解決，也不是平分政權或組織聯合政府可以滿足其欲望的。

共匪最初偽裝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來騙取美國人的同情，更經由國際共黨之助，得到一批美國的共黨同路人為他瞎吹亂捧，遂使美國短視兼幼稚的政治家、無聊的外交掮客，為他所利用。早在抗戰結束之前，已有若干美國人員奔走於延安道上，對共匪大送秋波，共匪遂因此而身價倍增，由本來無足輕重的叛亂集團，一躍而成為有國際地位的政治團體，公然與政府分庭抗禮。勝利後，復藉美國居間調處的掩護；共匪之所以能得勢於中國，美國實在給予不少的便利。可是共匪究竟是俄帝的螟蛉，並不念美國提挈扶植之恩，在其羽翼豐滿全面得勢時，亦全面發起反美運動，不斷製造仇美事件，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襲擊美軍，迫使美國放棄中國，孤立我中央政府，以便最後赤化中國，以至整個的亞洲。倘馬歇爾來到中國的時候能有警覺，認識共匪真面目，幡然改圖，積極協助政府，援助國軍，以一如後來援助南韓、南越的決心，不獨可以消滅共匪勢力，使中國政局安定下來；並且可以以後在南韓南越的犧牲亦可避免。可惜美國當時不此之圖，深怕得罪共匪，竟把這樣危及整個亞洲，影響全世界的嚴重問題，輕輕錯看，飄然置身事外，停止一切援助，後來還發表了白皮書，將一切責任推給中國政府，遂使我政府在大陸首由經濟崩潰，循至軍事失利，最後令共匪竊據了整個大陸，亦由此而導致了爾後的韓戰、越戰及

將來整個東亞的赤禍蔓延，這豈止是中國的不幸！亦美國的不幸，甚至是全世界的不幸！

安徽的復員與接收

我於重慶參加軍事復員會議完畢之後，因當時安徽省政府正自立煌移駐合肥，地方行政的復員與接收亟待開始，乃立即趕回合肥。

我回到合肥時，省府各主要機構已遷駐合肥開始辦公，遂於是月中旬於合肥召開安徽黨政復員會議。會中決定原來各縣對該年度施政計劃中之預定事項，仍按計劃實施，另議定有關復員、接收之事項如左：

1. 前此淪陷縣市之地方行政機關、工廠、建築物、學校等，由各該縣市長負責接收。民眾團體、及宣傳、文化事業，由各縣市委黨部負責接收。各專員公署應負責監督糾查，並分派省府廳處長或委員到各區視察。
2. 與光復地區相鄰之各縣市，除加強本身的建設工作外，應協助恢復光復地區之交通。
3. 各縣市接收工作人員，務潔已奉公，各專員公署每週亦應將接收情形、物資種類、數量列表呈報省府備查。
4. 清查淪陷前地方機關之檔案文件及圖書，以及淪陷時期敵偽地方機關所有重要事項之檔案。
5. 曾充任敵偽機關重要職務之人員，以及著名之惡劣份子，應查明事實報省核辦，不

得藉公報復，牽累無辜。

6. 不屬於縣市之機關，依其性質分別由省府各廳負責接收。其物資、建築物、案卷、文物，尤須詳為登記。
7. 為敵偽破壞之省屬機關、工廠、道路、學校、公共交通事業等，由各主管單位依據實際情形擬定修復計劃。
8. 各縣市為國捐軀或因公務傷殘人員，由各縣市詳為調查呈報，優予撫卹。
9. 各縣市須特別注意維持治安，肅清匪偽殘餘分子。

由於安徽在抗戰期間雖孤懸敵後，實際為敵佔領的城鎮與地區不多，同時共黨份子自三十六年秋天在皖東區那場戰鬥中失敗逃回蘇北之後，已不敢再來嚐試，因此安徽的接收復員工作比較簡單，沒有遭到共匪的阻撓；不過月餘即已接收並清查完畢。至三十五年三月，中央派監察使陳肇英先生前來視察時，見各項業務井井有條，表報賬冊莫不完備，深為嘉許。

三十五年四月，原第十戰區的部隊已按軍事復員會議的規定縮編完畢，戰區長官部於同月撤銷，我奉命專任安徽省主席。此時省政接收及復員工作均已完成，今後的主要工作當在從事建設，因之安徽未來的永久省治遂為省內人士所關心。有的主張仍遷回安慶，亦有主張即以合肥為省會者；兩派一時爭執甚烈。主張遷回安慶的，大抵以安慶為戰前省治所在，且控扼長江，天然形勝。主張合肥者，大抵以合肥位置適中，交通方便，且有充分擴展都市建設的餘地。由於兩說各

有理由，利弊互見，乃將此一問題正式提交省臨時參議會討論表決。討論結果，大多數以安慶受地形限制，幅員狹小，缺乏建設未來都市的條件，同意即以合肥為永久省會所在地。議決後，於是年冬成立安徽省建設委員會，以省建設廳長張宗良為主任委員主持其事。經過詳密的策劃與設計之後，於三十六年初開始第一階段的建設工程，預計於兩年內完成以下各項：

1. 建築省政府及各廳處，以及省議會之辦公房屋。
 2. 建築自來水廠及發電廠等公用事業。
 3. 拓寬合肥城內外街道。
 4. 修建以合肥為中心的公路及電訊系統。
 5. 協助淮南鐵路局修復淮南鐵路。
- 上述省會第一階級各建築工作，經積極的努力，至三十七年秋天已概略完成。惜此時戡亂戰局已有逆轉之勢，余亦適在此時調往華中長官公署任職，未能目觀其成。

空城計售喜極而泣

三十六年八月，當時國軍正集中兵力向魯南沂蒙山區之共匪巢穴進剿，原駐津浦路南段及長淮間地區，由前第十戰區二十一集團軍改編歸第八綏靖區指揮之部隊，均已奉調至徐州以北參加剿匪作戰。此時匪軍劉伯承部數萬人由豫北渡河南甯，於八月下旬經豫南之潢川、固始、商城，東趨六安、合肥。此時合肥已為安徽省治所在，但除省府之警衛營外別無駐軍。當劉匪到達六安

之後，省府上下及合肥民衆莫不爲之震恐。未幾復接獲合肥縣府電話報告，謂匪軍先頭部隊已到達六安以東之金井；當時雖知中央已令邱清泉自隴海路南下堵剿，但係隨匪之後趕來，距離尚遠，因此余亦不免爲之焦灼。金井距離合肥僅七十餘華里，匪軍且夕可至，此時若令省府各機關撤退在時間上已不容許，若言防守以一警衛營之兵力亦感不濟，乃忽然情急智生，當即下令合肥城廂內外各鄉鎮之國民兵團火速集合於合肥城外，由省府衛隊營爲骨幹派兵協助指導，連夜點燃燈籠火把趕築碉堡、戰壕等城防工事，並於各大建築物內樹立軍隊旗幟，派衛兵把守，且不時吹奏號音；同時以一部鄉鎮自衛隊在合肥城外由東到西，由南到北，來往運動，模擬已有大軍到達從事備戰的模樣。城廂內外居民一律各安其業不許逃避；各省政機構亦照常工作，不許張惶。我個人亦親赴城廂各處指揮部署，督導施工。如此經一晝夜，至翌日下午接得自金井方面之報告，謂劉匪於午前已轉向舒城方面竄去。余聞訊如釋重負，不禁喜極而泣。一晝夜來我雖外示處之泰然，內心實不免爲我的空城計憂也。由於我的態度鎮定，在此期間省府上下各級人員及合肥市民竟無人要求遷避。參議會議長長江嘯先生，我因其年事已高恐不堪驚擾，暗示其離開合肥暫避，彼初亦堅持不去，表示要伴我守城，後經我再四催請，始允乘車前往蕪湖。我之喜極而泣，蓋亦爲安徽父老對我忠誠信賴，臨危不棄而有動於衷也。

越日追剿劉匪之邱清泉部始趕至合肥。因劉

匪已竄往舒城，邱部某旅隨後追趕；後該旅在舒城以西遇匪伏擊，損失慘重。又越日，第八綏署所屬第四十六軍亦自皖北趕回並對劉匪追擊，劉匪乃經大別山向鄂東、豫南方面竄走。

此次劉匪伯承南竄，未乘虛進襲合肥，而中途折向舒城，是否因我的空城計所炫惑不得而知，惟我事後回想總不免心有餘悸；當時有感於此，因作五言古詩一章，以誌其事，題爲合肥却敵，抄錄如次。

已掩東伐鼓，何來鳴埴鉦；
 籛牆變患起，瞬息喪遼寧；
 湖北脫鞵繫，烽烟漫兩京；
 大軍爭魯北，八皖已空營；
 賊虜乘虛入，江淮萬戶驚；
 敵鋒迫淝水，急智膽邊生；
 奮起召羣衆，鳴戈揚戰旌；
 懸燈夜築壘，詐示大軍聲；
 普敵知吾性，聞風竟退兵；
 臨危施妙算，諸葛守空城；
 成敗雖難卜，人謀亦可勝；
 援軍指日到，一戰慶救平。

由於劉匪之竄大別山周圍，中央深恐日久成爲隱患，未幾派白崇禧部長於九江成立剿匪指揮所，專任清剿竄擾豫皖鄂邊區之劉伯承匪部。

是年十一月月中旬，白部長於九江召集有關軍政主管人員，召開剿匪軍事會議，電邀我前往參加，提供剿匪意見。抗戰期間我在大別山六、七年之久，基層黨、政工作均有相當基礎，自信當地居民深明大義擁護政府，對剿匪軍事必然支持。會後大軍即開始進剿，至三十七年春，劉匪終於無法在大別山駐足，不得不向豫西回竄與陳賡合流。

我在九江會議之後，曾乘便重遊廬山，時值

深秋，景物蕭瑟，感懷戰亂，不勝唏噓，遊興頓減。翌日即乘機經蚌埠轉回合肥。是時，中央爲統一指揮蘇魯豫皖剿匪軍事又成立徐州綏靖公署，以顧祝同上將爲主任我兼副主任。

我回到合肥，正值辦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投票完成，安徽各縣代表均順利選出。我亦由原籍蒼梧父老以三十餘萬票推選爲國大代表，旋奉總裁指示退讓友黨，乃即辭去。是年十二月及翌年元月又分別選舉監察委員及立法委員。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至五月一日閉幕，選出蔣公中正爲總統，李宗仁爲副總統，並於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我國從此進入憲法之治。惟自政府決心行憲以來，共匪深知其邪說並不受廣大羣衆歡迎，依法競選必然慘敗，於是變本加厲發動全面叛亂，阻撓憲政之實施；政府雖於排除一切困難之後，終於完成普選，選政於民，可是此時共匪的叛亂已益爲擴大，漫天烽火，警報頻傳，大局反而日趨險惡了。

中共乘機發動叛亂

三十七年春，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前後，戰亂局勢已面臨惡化。在大會揭幕之前，東北事實上已只剩下長春、瀋陽兩座孤城，陸上和海上交通線都已被共匪切斷，完全仰賴空運維持。華北的平綏線、山東的膠濟線、河南的隴海線，在大會開會期間也都紛紛告警；洛陽和濰縣都是在此一期間失守的，可見當時共匪已轉取攻勢，而

且攻擊力量已不容忽視。那時南京方面正在選舉總統副總統，總統一席以蔣公勛業之隆萬民仰戴，自然非蔣公莫屬，可是副總統一席角逐者多，却爭得相當熱鬧，此時所有的人，連報章雜誌在內，都將注意力集中於選舉之上，而忽略了當時局勢正在惡化。

大會閉幕之後，我國軍之形勢已陷於被動，中央為鞏固華中，貫徹戡亂，作未雨綢繆，籌議成立一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的軍政統轄機構，由原國防部長白崇禧出任軍政長官。籌議之初適我亦因公前往南京，故得預聞其事。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黃河以北可能已為共匪所控制，江、河之間尚可與爭，長江以南政府必須採取一切措施，力求鞏固；因此我很贊同派一大員坐鎮華中，統率大軍屏障西南，北控鄭、許，使南京中樞能一意應付津浦線之上作戰。

五月底，行憲新政府正紛紛改組成立，白崇禧既未入閣，以之擔任華中軍政長官一職自屬適宜。果然在六月初，我於合肥接得白部長的電話，謂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已決定成立，中樞派彼前往負責，並邀我出任他的助手副長官。華中軍政長官公署之設立雖早經預聞，但出任他的副手，却是我所未料到的事。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既不便在電話中商定，也不便肯定作答，我只好說我對任何職務都無所選擇，只要中樞考慮我能以勝任的事，我都樂於效命。

六月下旬，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白長官復以電話告我，說他已向總統蔣公請准派我為副長官，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職已另派員接任

。不期此事果然就此定案了。不久正式命令到達，我於交代擺搖完畢之後，於八月下旬始離合肥赴京。

我是二十九年元月接任安徽省政，到三十七年七月，整整八年又半。我與安徽父老兄弟姊妹推誠相與至為融洽；自投身軍旅以來，除湖南外從未在一地服務如此之久，因此安徽真有如我的第二故鄉，一旦卸職離去，頗有不勝依依之感。

安徽省議會獲知我調職是無法挽留的，特召集會議全體通過贈我以安徽省的榮譽公民以表親切之意，並頒授證書。臨行時合肥各界父老及機關團體列隊相送，長達里許，我幾度停車與他們握別，欲語哽咽；看他們凝重的表情，想起這番較日寇更為兇殘的紅禍，真是不忍離去，及車抵南京猶悵懷若失，感與書懷，因賦七律一首如次：

辭安徽省政府主席留別父老及同仁

揮手臨歧別皖疆，清風拂袖九秋涼；
朔雲幻變干戈後，國事嫺嬾歲月長；
八載同仇如手足，一朝遠別感參商；
離懷幾許情難訴，霜冷方知晚菊香。

余到京後，翌日即謁見總統蔣公，報告安徽地方情況及請示今後工作方針。當時總統蔣公想起民國二十八年我在鄂北因先母逝世電請辭職奔喪的事，垂詢先母營葬情形，我以抗戰勝利後緊接剿匪戡亂迄未返里有虧子職，並乘機請假，當蒙蔣公給假兩月返里營葬；總統慈孝榮及先母，感戴難忘。

我將返里葬母事電告白長官之後，於九月初由南京經上海搭機飛廣州轉赴梧州故里，臨行

總統蔣公及副總統均先後賜宴餞行。經上海時，正是金元券發行之後，政府執行經濟管制，京、滬商人屯藏物資不肯出售，市面蕭條，黑市猖獗，當時我認為軍事上前方打一兩次敗仗關係不大，但如果這次幣制改革再不能收到維持幣信穩定物價的效果，人民生活感受痛苦，以致對政府的戡亂失去信心，則其後果當至為嚴重，不禁惘然憂之。

中旬抵家門，一別十餘年，與家人、父老相見，自是悲喜交集，殷殷存問，無限親切；惟昔在襁褓孩提中的子姪輩，此時皆已玉立亭亭，對我似大有陌生之感，一時想起賀知章那首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詩，誠不勝感慨。時先母已由家人先擇地安葬，惟尚待建墓立碑，余遂於告祭後鳩工勸石。不期假期尚未屆滿即迭接白長官的電報，促我即日赴鄂。那時我從報上獲知長春、瀋陽均相繼淪陷，濟南、鄭州也已棄守；各地物價飛漲，京、滬一帶已發生搶米風潮，情勢之嚴重，不難想像。於是匆匆啓程，經桂林轉乘火車赴鄂，於十一月中旬到達武漢；車甫入站即發現白長官及長官公署各處長，地方行政主管等人員均在車站迎我，私衷感甚。

我到達武漢之時，徐蚌會戰已經開始，過了幾天不利的消息不斷傳來；先是黃伯韜兵團在碾莊被圍，苦戰十餘日，彈盡援絕，自殺殉國。黃伯韜兵團消失之後，共匪陳毅部自徐州東面直趨宿縣，徐州遂陷於四面包圍之中。最後自徐州突圍之國軍，與向徐州增援之國軍均分別為匪所圍困，突圍不果，幾全部犧牲。（未完）